

经典

趣读

系列



JING
DIAN
QUDU
XI
LIE



夏传才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论语趣读

经典趣读系列

夏传才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趣读/夏传才著. -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
(经典趣读系列)

ISBN 7-80611-873-X

I.论… II.夏… III.论语-通俗读物 IV.B2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1611 号

论语趣读

夏传才 著

责任编辑:李津生

装帧设计:小明 赵健

美术编辑:赵小明

责任校对:李伟

封面题字:韩羽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邮政编码:050071 <http://www.hspul.com>

E-mail:hswwybs@public.sj.he.cn

Tel:0311-7042501 转

Fax:0311-7837506

印 刷:邢台市新华印刷厂(邢台市新华南路 116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12.375 印张 237 千字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4.00 元

ISBN 7-80611-873-X/I·779



目 录

孔子其人其书	(1)
《论语》这本书的来历	(1)
中国的“圣经”	(6)
我童年读《论语》的故事	(10)
半部《论语》治天下	(16)
真孔子和假孔子	(19)
“天生圣人”——神圣的偶像	(23)
素王和圣王	(27)
孔教教主	(33)
“打倒孔家店”答客问	(36)
现代反孔的野心家	(42)
凡人孔子	(49)
《论语》论学习	(53)
学而时习之	(53)
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57)
论“学而优则仕”	(63)



孔子和做官	(66)
每事问	(69)
三人行必有我师	(71)
学习乐	(75)
学·思·行	(79)
继承与革新	(83)
孔子“述而不作”	(90)
好心办坏事	(92)
别靠小聪明	(93)
诚信和大节	(95)
直和方式方法	(97)
勇敢与捣乱	(99)
刚强与疯癫	(101)



《论语》论天命鬼神	(103)
自然的天和宇宙的主宰	(103)
获罪于天无所祷	(106)
天保佑	(107)
指天赌咒——子见南子	(110)
不欺天	(113)
不怨天	(115)
死生有命	(117)
富贵在天	(121)
敬鬼神而远之	(123)
不卜筮不祈祷	(126)



孔子为什么重祭祀(128)

《论语》论仁 (131)

仁者爱人(131)

孝悌为仁之本(134)

何谓“仁人” (136)

爱与恶(146)

修身达仁(149)

克己复礼为仁(154)

当仁不让于师(160)

杀身成仁(162)

《论语》论品德修养 (165)

忠恕(165)

什么是孝(170)

顺从不一定是孝(174)

殡葬问题(179)

当代怪现状——父母孝顺子女(18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186)

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189)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193)

智和勇(195)

温良恭俭让(199)

信和义(207)

中庸之道(210)



礼之用,和为贵	(219)
知耻和改过	(221)
吾日三省吾身	(223)
三友三乐三愆三戒三畏	(225)
正气	(230)

《论语》的政治思想

大同理想	(234)
小康社会	(239)
礼治	(244)
尊王	(248)
君臣关系	(253)
富民政策	(256)
节用	(259)
苛政猛于虎	(261)
不患寡而患不均	(266)
省刑罚	(267)
屏四恶	(269)
毛泽东论孔子的“正名”	(272)
粮食、军备和民心	(276)
战争与和平	(279)
明夷、夏之辨	(284)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290)
贤人政治	(293)
欲速则不达	(299)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301)
再谈孔子做官	(303)

《论语》论教育

有教无类	(310)
束脩和学费	(313)
为什么孔子没有女学生	(316)
教育目的	(320)
德育第一	(322)
全面发展	(326)
平等相待,一视同仁	(331)
尊师爱生,师生平等	(334)
相互切磋,教学相长	(338)
因材施教	(343)
循循善诱,触类旁通	(346)



日常生活中的孔子

平凡中的不平凡	(351)
孔子的养生之道	(355)
从“孔府家宴”到“孔府家酒”	(358)
孔子与仪表	(362)
孔子的经济状况	(368)
音乐迷	(373)
道不同不相为谋	(377)
孔子选女婿	(382)



与隐者的对话 (384)

后记 (387)





孔子其人其书

《论语》这本书的来历

两千三百年前的孟子说过一句读书的门径：“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这句话说的是读书要了解作者：“知人论世”。直到现代，我们的语文教学还遵循这句话，教师讲解一篇文章，先要讲“作者介绍”，再讲“时代背景”，然后才讲解本文。我们读《论语》，也要这样。

《论语》是两千五百年前的一部书，主要记录孔子的言论和行事，也有一部分是记录孔子弟子的言论。它是一部语录体的书。记录者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

那个时代是春秋时期末年，当时还没有发明造纸，也没有印刷术，出一部书很不容易。人们要把重要的事或言论记载下来成为文献，得在竹片上刻字，称为竹简，每片竹简上刻不了多少字，然后按照顺序，用皮革





割成的皮绳串起来。一篇文章的竹简，一个人搬不动；一部书的竹简，就必须用牛车拉了。所以古人有句“汗牛充栋”的成语，形容书多累得牛出汗，而保存它们能堆满空间很大的房厦。孔门的徒子徒孙费这么大的力气来记录和编辑《论语》这部书，并且代代抄刻相传，可见在他们的心目中，这部书具有多么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实用价值。

当然，到了汉代，书籍的流传渐渐有了进步，产生了帛书，即把字写在丝织的绢上，把写有字的绢卷起来，一卷一卷的内容相连。东汉的蔡伦发明了造纸，起初还不能用于书写。往来书信、文件，还都是帛书。从这些年的出土资料来看，西汉初期墓葬中的书籍还是竹简，而东汉时期墓葬中的书籍是帛书，而敦煌文书和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汉文文书，已经是纸张的写本了。



不论是简书、帛书、写本，在发明印刷术之前，都靠抄写。在口耳相传的时候，难免有记忆不准确或记述不完全的情况；在传抄的过程中，也难免有讹误，或者抄写的人图省事，某个字用别一个字代替，称为“假借”。所以，中国的先秦古籍，大多有不同的版本，在字句、段落，乃至篇章数目和顺序上，往往有较大的差别。《论语》也这样。

西汉初传授《论语》，主要有三种版本，两种是用今文（指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书写的，称今文《论语》，有《鲁论》和《齐论》两家；一种是用古文（指战国通行的文字小篆）书写的，称《古论》。这三家各有师傅传授。古文



《论语》声称自己这个版本是鲁恭王刘余在翻修孔子故宅时于夹壁墙中发现的，所以是最可靠的；今文两家则声称《古论》是伪作，不可相信，而《鲁论》和《齐论》两家也互相攻击。所谓“王婆卖瓜，都说自己的瓜甜”，打着纠缠不清的笔墨官司。

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他先讲《鲁论》，又讲《齐论》，于是以《鲁论》的篇目为根据，采纳了《齐论》中可取的部分，将这两个版本融合为一，称为《张侯论》，可以说他完成了《论语》的第一个校勘本。因为张禹的地位尊贵，当时的儒生都尊奉这个版本。为使传授《论语》有统一的依据，东汉灵帝时刻“熹平石经”，便用《张侯论》，这个版本通行天下。

到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依据《张侯论》，又参照《齐论》和《古论》，作《论语注》。魏代的何晏等五人又依据郑玄的《论语注》，作《论语集解》，就是收在宋代编纂的《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的本子。所以，我们现在阅读的《论语》就是《张侯论》这个版本，而它的注疏却汇集了《鲁论》、《齐论》、《古论》和汉魏各家的解说。何晏等的《论语集解》，是现存最早的注本。

张禹是个政治名声很不好的“佞臣”，但这与他校勘《论语》而完成一个通行天下的传本，是两回事，不必“因人废言”。张禹本人是无耻的政客，但《论语》这本书记录的是孔子的言论，他只是把几个传本比照作校勘而已。

《论语》现存二十篇，四百七十余章，其中大部分是孔子的言行录，基本上都是孔子的学生在当时记录、或





后来追记的。从这些章节尊称“子”、“子曰”、“夫子”，可以证明它们决非孔子自己写的；由此也可以推断，这些章节最初记录的时间是在春秋末年孔子生前或死后不久。

书中孔子学生的言行录，基本上是由他们的学生记录下来的，由这些章节屡用“曾子曰”、“有子曰”之类尊称，可以证明是他们的学生所记，并可以推断记录时间是在春秋末年及春秋战国之交。

曾参是孔子最年轻的学生，孔子死时曾参才二十六岁，曾参活到七十岁，那时孔子逝世已经四十四年。《论语》中有一章是记录曾参临死前与鲁国孟敬子的谈话，那时孔子其他的门人大概都死了。《论语》中时间最晚的记录，无疑是曾子的门人记的，而且全书中所记除了孔子的言行录最多，其次就是曾子的言行录了，而且处处用尊称，不直称其名，所以可以推论是由曾子门人最后编纂的。书中所记言行录的时间跨度不下五十年，所记录的有些发生在曾子入学以前，曾子的门人可能还没有出生，能传到几十年之后，一定有人把许多人陆续的记录集中起来，而且书中有些章节前后重复出现于不同的篇次，可证不但记录者不是一个人，编纂者也不是一个人。曾子的门人只是最后的记录者和编纂者。

《论语》中的记事，时间最晚的是曾子临死前与孟敬子的谈话。曾子死于公元前 436 年，而“敬子”是谥号，人死后才能受谥，书中称他的谥号，必在其人死后，而公元前 429 年此人还从事政治活动，所以这本书的编纂，只能在公元前 429 年之后。从这些考证来看，可以推定





《论语》成书在公元前 400 年左右，距今已经两千四百年。

由于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在语法、词汇、语音各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读古书，必须要有注解。不但我们现代人读《论语》需要注解，连汉代的人读先秦古籍也需要注解。西汉建国，距离《论语》成书，不过二百年，《鲁论》、《齐论》、《古论》、《张侯论》的传授，都对字词文句作训释，他们讲的并不完全相同。东汉末年郑玄的《论语注》是当时的名著，原本现在已经残缺不全。现在流传的最古的全注释本，就是以郑玄的注本为底本，由魏代何晏等五人共同完成的《论语集解》，它汇集了两汉和汉魏之际的诸家许多可取的注解。梁代的皇侃，为这本《集解》又作《论语义疏》，唐代传入日本，最受日本人重视。到了宋代，邢昺又为《集解》作新疏，名为《论语正义》，与《集解》合称《论语注疏》，通行至今。



《论语》内容丰富而文字简约，为注释和讲解留下发挥的天地，古代释《论语》的书达三千余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南宋朱熹《四书集注》中的《论语章句集注》，训诂、义理并重，也较为通俗易解，是明、清两代的科举用书。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写作历时三十八年，集前人注疏之大成。近人杨树达的《论语疏证》，以事例为证，疏解《论语》古义，考订是非，解释疑滞，发明孔子学说。近人钱穆的《论语新解》，以篇次为序，对原文注释、解析、串讲，并作白话试译，不乏新见，在海外较



为流行。近人程树德的《论语集释》，引录典籍六百八十种，取舍严谨，博而不滥，体例周备，疏解详明，是集古今《论语》注疏之大成的著作，有助于深入研究。今人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则是当代注释简明的较好的白话译本，流传广泛。

古今《论语》注释讲解的书，不下四千种，五天读一种，五十年也读不完。我们当然不能把这些读到头发白，有志于研究《论语》的人，能够钻研上面举出的代表著，就很不错了。

中国的“圣经”



论
语
趣
读

孔子主要以教学为职业，生前一共有三千个学生。他死后，他的学生形成儒家学派，尊奉他为祖师。《论语》这本书既然记录孔子与学生的谈话，表达了孔子的思想言行，也就由儒家学派代代传授下来。

从战国一直到西汉前期，《论语》这本书和战国诸子的书，如《老子》、《庄子》、《墨子》、《孙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等，同列为“子书”，并无特殊尊崇的地位。

汉武帝刘彻是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稳定边境，开拓疆土，建树了赫赫武功；又重视文治，谋求国内长治久安。汉代前期，诸子百家学说并传，各有各的信徒，在朝政大事上也常常争论不休，需要治国的统一的指导理论。汉武帝接受了儒臣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就是让诸子百家学说一律靠边站，只提倡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指导理论，来实现思想统一，建立对全国的思想统治。

这里讲《汉书·儒林传》记载的一个小故事。

武帝的父亲景帝时，儒家大学者辕固与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论汤武革命的问题。所谓汤武革命，指商汤诛杀了夏桀而建立商王朝，周武王诛杀了商纣王而建立周王朝。黄生说：“汤和武都是靠武力杀了桀和纣而得天下的，并不是受天命。”辕固说：“不然，桀和纣，荒淫无道，汤和武都是顺应民心而诛杀桀和纣的，天下的民心归向他们，天命就是民心，这不是受天命又是什么呢？”黄生说：“帽子虽然旧，也必然要戴在头上，鞋子虽然新，也一定用脚穿着踩在地下；这是上下之分。桀和纣虽然无道，但他们是君上；汤和武虽然明智有德行，但他们是臣下。君主有过失，臣下只能正言规劝帮助君主改正过失，不这样做，反而诛杀君主取而代之，这是不对的。”辕固说：“如果照你这样说，我们高祖皇帝代秦而即天子之位，不也是不对的吗？”汉景帝听到这里，就阻止了他们的辩论，向辕固说：“吃肉的人不吃马肝，（因为马肝有毒），谈学问的人不谈汤武受命，不会有人说你愚蠢。这个问题，不必再谈了。”窦太后喜好《老子》，召辕固问这本书。辕固说：“这是家人奴婢看的书。”太后大怒，叫人把辕固扔到猪圈里去，让他把猪击死以后再放出来，不然就与猪为伍。幸亏景帝扔一把刀给辕固，才把猪刺死。以后，辕固便年老退休回家。武帝即位，又





征聘他来朝廷任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返聘”，直到轅固九十多岁去世。

武帝确定了以儒学为统治思想的文化政策，重用儒士，征聘名师讲授儒家经典。《汉书·武帝纪》记载了一个“安车蒲轮”的故事。鲁国的申公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儒学大师，汉武帝征聘他到朝廷来，但是申公已八九十岁了，那个时代没有小轿车、软卧列车，也没有飞机，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马车。武帝命令制造宽大的车厢，用蒲草包住车轮，减轻长途颠簸之苦。

不要以为汉代的统治者真的信仰儒家学说，从轅固与黄生辩论来看，汉景帝就很不喜欢儒家《易》传里“汤武革命顺应人心”的学说。孟子也说过：“未闻诛君也，诛一独夫耳”，他把桀、纣称作独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诛一独夫而安天下之民，有什么不好？这话，当皇帝的不爱听。皇帝都自称“寡人”，没有人能与他比肩，当然就是“独夫”。他对老百姓做坏事，就可以把他推翻，砍他的脑壳。哪个皇帝肯接受这个思想？所以，朱元璋由平民造反，做了明朝的开国皇帝，马上就变了，听《孟子》书上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他就拍桌子发火：“他把我放在老百姓下面，这老头不死，非严办不可！”于是下令把孟子塑像赶出孔庙。还把《孟子》这本书大段大段地删掉。所有的封建统治者都不可能真心接受儒家民本学说中的那一丁点民主思想。

不过，朱元璋毕竟是个流氓出身的皇帝，文化素质太差，不如他的前辈——汉武帝深谋老算。刘彻大张旗

